

## 国际政治

# 非洲内部冲突的区域化趋势：一种综合安全观<sup>\*</sup>

郑先武

〔摘要〕 后冷战时期，非洲内部冲突通过跨边界扩散而日益呈现出一种区域化趋势。从冲突的根源及其现实影响看，这种区域化又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即它涉及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等多个层次和军事、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多个领域，以致形成一种多层次、多领域紧密互动的安全格局。这客观上要求非洲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应该在其内部冲突解决中承担起核心角色。

〔关键词〕 冲突的区域化；综合安全；非洲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1)05-0001-06

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内部的战争与暴力冲突此起彼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和美国、法国等国家通过调解、维和乃至军事干预等多种行动不同程度地介入非洲内部冲突<sup>〔1〕</sup>解决之中。但这些外部行为体首要关注的是冲突的抑制，即通过抑制现有的组织化军事暴力实现或维持和平的状况。所以这种和平即使得以实现和维持也常常难以持久。这就是所谓“消极和平”。而“积极和平”的实现和维持必须解决产生组织化暴力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结构性问题。<sup>〔2〕</sup>鉴于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非洲内部的冲突就必须对其本质特征有明确的认识。实际上，后冷战时期，随着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非洲内部冲突的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即它通过跨边界扩散而日益呈现出一种区域聚集。从冲突的根源及其现实影响看，这种区域化又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即它涉及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等多个层次和军事、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多个领域，以致形成一种多层次、多领域紧密互动的“网状”安全格局。这就是当前非洲内部冲突的本质特征。本文即通过对非洲内部冲突的这一典型特征的解读，试图为非洲实现和保持“积极和平”提供一种分析和理解问题的出发点。

### 一、国家、次国家层次的动力

如果将区域作为安全问题分析的核心层次，非洲内部冲突的区域化就既有“从外到内”的动力，又有“从内到外”的动力。这里的“外”主要指全球层次，“内”包括区域、次区域、国家、次国家等层次。来自国家和次国家的行为体有时相互合作，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有时又相互竞争乃至排斥和敌对，形成一种恶性互动。这种复杂的安全相互依赖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非洲内部冲突的本质、强度、深度和广度，从而在非洲内部冲突的区域化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用默罕默德·阿约伯(Mohammed Ayoob)的话说，这种安全的内部维度是决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安全问题的“核心变量”。<sup>〔3〕</sup>

从国家层次上看，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国家建设进程之中，国家权力整体上仍表现出较低的水平。按照戴维·弗兰西斯(David J. Francis)的解释，国家广义上可被定义为拥有在特定的领土和人口范围内行使合法的强制手段和对运用武力的独占权，并得到国际承认的一系列制度。国家作为管理特定领土的权威的决策实体，它被赋予向其人民提供包括福利、和平、秩序和安全在内的一系列基本功能的义务。实际上，国家拥有 3 个相互联系的功能，即作为有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编号 06BGJ005)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南京大学“985 工程三期”建设资金和“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权组织决策并得到承认和接受的主权权威、作为拥有决策权威的无形的认同标志和作为制度和民主、安全的首要提供者。站在合法性角度看，国家主权拥有外部和内部两种纬度。“外部合法性”又称外部主权或司法上的主权，指国家作为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合法的和平等的成员得到国际承认，使之能够在日益独立的现代世界中参与国际关系和交往。“内部合法性”，又称内部主权或事实上的主权，包括领土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前者指国家得到生活在特定领土内、拥有共同价值观和认同的人民的同意，有权依照国际法在与之相关的所有领土内行使权威和控制；后者指国家作为建构权威的基础，有权通过得到承认的宪法工具代表其民众展开行动。<sup>[4]</sup>

从这一角度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拥有较弱的“国家特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外主权和内部主权行使上存在巨大鸿沟，即它们在国际体系内被其他国家承认为主权独立实体，却没有能力在其自身的领土内行使有效的权力或保护自身免于外部入侵。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等人将这类国家称作“准国家”(quasi-states)。它们有司法上主权国家属性，但实质上的主权国家属性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制度不健全、经济基础脆弱、欠发达，几乎谈不上国家的统一。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法律上、司法上的国家”，而非“实质上、经验上的国家”，属于当代国家体系中“弱国家”的类型。<sup>[5]</sup>非洲国家也常被称作“失败国家”、“崩溃国家”或“前现代国家”等。<sup>[6]</sup>这些国家尤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部非洲、大湖区和“非洲之角”，呈现明显的区域聚集。按照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07—2010年连续4年的“失败国家指数”对全球38个“失败国家”最具脆弱性的排序中，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一直排在其中的就有22个左右，其中索马里、苏丹、乍得、津巴布韦、刚果(金)一直排在前7位；在2010年的排序中，索马里、乍得、苏丹、津巴布韦、刚果(金)更是排在前5位。<sup>[7]</sup>

这种“弱国家”形态与非洲各种类型的内部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冲突包括：革命性战争，即政府与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政治上有组织的挑战者之间持续的暴力冲突；族群战争，即国内的民族、宗教派别或其他少数民族挑战政府，以寻求自身地位重大改变的持续的暴力冲突；不良的政府变迁，即治理形态中重大的、突然的转变，包括国家崩溃、严重的政权不稳或威权主义政治取代民主等；大屠杀和政治镇压，即由国家或其代理人推行的持续的政策或国内战争导致的公共

和政治集团成员的持续的大量的死亡。<sup>[8]</sup>据统计，20世纪80—90年代，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持续发生的或最近才停止大规模冲突的国家有利比里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苏丹；稍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国家有乍得、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莫桑比克、南非；90年代开始新的大规模冲突的国家有刚果(布)、科特迪瓦、刚果(金)、几内亚比绍，发生小规模冲突的国家有科摩罗、吉布提、马里、纳米比亚、尼日尔、塞内加尔、津巴布韦，发生政治性暴力的国家有中非、加纳、肯尼亚、莱索托、毛里塔尼亚、多哥等。目前，有30多个非洲国家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内部冲突，而这些国家绝大部分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sup>[9]</sup>“弱国家”形态已构成影响非洲安全的重要的“区域纬度”。

现实表明，非洲国家内部各种严重的冲突常常是在合法的中央政府与各种次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展开的。而正是其弱国家的特征给这些组织化的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滋生提供了沃土。这些行为体反过来不断地掏空国家，并形成一种强大的扩散不安全因素的跨国主义，从而推动着非洲安全的区域化。来自次国家层次的影响国家和区域安全的行为体或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民族分离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反对派政党、商业集团(包括走私集团、军火商等)、农牧业主、雇佣兵，等等。例如，在非洲之角的各种冲突中，民族分离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影响巨大，它们作为原合法政府核心的挑战者常常是内战或武装冲突中重要的一方。在利比里亚、刚果(金)等国的内战中，反对派政党及其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了先导作用；各种战略精英联盟、商业集团和雇佣兵等跨国的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0]</sup>根据联合国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2002年10月，有85家公司违反了国际规则，在刚果(金)内战中与交战各方保持“供应链”关系，由此建立起由关键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精英组成的“精英网络”。<sup>[11]</sup>这种国家层次与次国家层次之间紧密的互动已成为非洲安全区域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 二、区域、次区域层次的动力

在非洲，虽然各种武装冲突绝大部分源自国家内部，但它们时常跨越国家边界呈现区域扩散之势，因而成为非洲安全区域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这方面，西非、非洲之角(非洲东北部)、大湖区(中部非洲)等次区域成为“重灾区”。在西非，最严重的是利比里亚内战的区域化。利比里亚内战正式爆发于1989年12

月。这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NPFL)向塞缪尔·多伊(Samuel Doe)为总统的利比里亚政府发起的战争。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与利比里亚的邻国联系在一起。战争前后,查尔斯·泰勒不但得到利比亚、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西非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而且在战争中崩溃的利比里亚使整个西非陷入一种“发展的利比里亚战争经济”。一个直接的连锁反应是,塞拉利昂最著名的反叛者福迪·桑科(Foday Sankoh)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RUF)利用该地区的混乱于1991年3月向塞拉利昂军政府发起战争。利比里亚内战外溢到塞拉利昂强化了西非次区域的战争或冲突的区域化。福迪·桑科及其支持者直接得到泰勒领导的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和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利比亚等西非国家的支持。而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政府鼓励和支持了利比里亚反对泰勒的“争取民主联合解放运动”(ULIMO)组建。战争期间,几内亚的反叛集团“几内亚民主联合阵线”(RFDG)在泰勒和桑科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下,从利比里亚领土对几内亚发动了入侵,波及几内亚整个边界沿线的村庄和市镇。作为一种回击,几内亚支持了“利比里亚人争取和解与民主联盟”(LURD)利用本国领土攻击利比里亚。<sup>[12]</sup>

在中部非洲,1993年爆发的布隆迪内战和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开始了长达10年的暴力冲突。两国的冲突很快扩散到刚果(金),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区域化的战争。1996年,在卢旺达和乌干达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下,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 Désiré Kabila)领导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同盟”(AFDL)向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领导的政府发动战争,并于1997年5月推翻蒙博托政府,自任新政府总统。1998年3月,乌干达和卢旺达转而反对卡比拉政府,并支持新的反政府武装“刚果争取民主联盟”(RCD)和“刚果解放运动”(RCD-ML)对卡比拉政府所进行的战争。两国认为卡比拉支持了两国的反政府武装。卡比拉将卢旺达和乌干达的行为视作对刚果(金)领土和政治主权的侵犯。卡比拉得到来自苏丹、利比亚、纳米比亚、乍得、刚果等国军队的支持。刚果(金)内战演变为“非洲的首次世界战争”。<sup>[13]</sup>

在非洲之角,冲突的区域化的形势更加复杂。长期以来,该次区域的大多数国家为战争和武装冲突所困,包括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战争和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的内战。由于非洲之角与长期陷入政治动荡的西非和大湖区两个次区域紧邻,又因与中

东的紧密联系而被称作“非洲-中东次区域”,因而其内部战争和暴力冲突具有明显的内部和外部纬度。这里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内部相互影响,外部既有来自中东和东非次区域国家的支持,又影响到大湖区和中部、南部非洲等次区域。比如,埃-厄战争期间,厄立特里亚得到了埃及、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支持;吉布提因在战争中支持埃塞俄比亚而受到厄立特里亚的“惩罚”;它支持了吉布提境内不同政见的阿法尔民族集团的叛乱;两国相互支持对方境内的反叛武装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埃塞俄比亚实际支持了“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ELF)等,厄立特里亚支持了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解放阵线”(OLF)等。埃-厄战争还扩大到索马里。两国支持索内战中的不同派别。1996年、1999年,厄立特里亚两次军事介入索马里,支持“索马里民族阵线”(SNF)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的争斗。2006年12月,埃塞俄比亚宣布公开介入索马里内战,对索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法院联盟(ICU)进行军事打击。在苏丹内战中,在美国的资金支持下,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向“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丹人民解放军”(SPLM/A)提供了直接的经济和军事帮助。鉴于此,弗兰西斯将非洲之角称作“非洲的悲剧以赤裸裸的暴力方式演绎的舞台”。<sup>[14]</sup>

总之,后冷战时期,非洲复杂的内部冲突及其对国家和社会的毁灭性影响使之成为“持久地进行着反对自己的战争的大陆”。<sup>[15]</sup>

### 三、全球层次的动力

全球层次对非洲安全区域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带来的便捷的信息技术、快速的资本流动和宽松的市场准入,不但赋予了现代战争和冲突特有的跨国和跨边界本质,而且大大便利了依赖于外部支持的“战争经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安全的区域化。冷战结束后,轻型武器在非洲灰色和黑色市场上的走私上升了。在西非,50%的武器交易是非法的。在这些交易中,武器提供者的主要动机是经济所得。非洲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也在增多:1990—2002年间上升了6个百分点。其间,在非洲发生的296起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中,有6177人伤亡,仅次于亚洲。“9·11”事件后,非洲恐怖主义被证实与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有联系。2003年,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lobal Witness)发布的报告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地组织卷入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塞拉利昂和利

比里亚等非洲国家的钻石贸易,从而与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另外,非洲之角已成为基地组织重要的活动场所。这些恐怖组织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当地的冲突之中。<sup>[16]</sup>

二是全球化所加剧的全球经济不均衡和不平等发展与非洲的安全区域化联系起来。战争与武装冲突的持久性和易复发性是非洲内部冲突的一个典型特征。尽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影响其复发的重要因素是经济上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球贫富差别仍在扩大,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发展停滞不前。在人类发展属于低水平的31个国家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占了28个。<sup>[17]</sup>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63个低收入国家中,有38个国家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sup>[18]</sup>而这些国家与战争和冲突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是冷战后超级大国间全球性竞争的结束,既影响了西方大国对非洲的政策,又部分地改变了非洲国家的战争性质,从而推动了非洲内部冲突的区域化。在20世纪50—80年代,民族解放战争或反殖民战争是非洲内部战争的共同特征。而且,在冷战大背景下,这些战争的绝大部分被纳入两个超级大国所支配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竞争之中,以致“这些解放战争的区域纬度潜在地被冷战背景所限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许多被超级大国所支持的傀儡政权崩解了,先前被冷战所遏制的冲突也转变为流血的内部战争。涉及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集团的“认同为基础的战争”和“资源为基础的战争”等所谓“新战争”(new wars)成为非洲战争与冲突的基本形态。<sup>[19]</sup>西方大国对非洲尤其是最贫穷国家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这些非洲国家“不再期望能够利用它们的战略地位、矿产资源或在区域冲突中的政治支持,作为与超级大国讨价还价的筹码。”<sup>[20]</sup>这种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尤其影响到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卡琳·多肯(Karin Dokken)就此评论:“对于经济援助来说,它意味着条件改变并被削弱了。对于军事援助而言,它意味着一种实质性削减。在很大程度上,非洲国家现在被置于一种安全-政治真空之中。”<sup>[21]</sup>

#### 四、综合安全的动力

上述分析表明,在非洲内部冲突区域化的格局中,战争和武装冲突尤其是国内冲突始终处于中心位置。但这种区域化的战争与冲突所引发的军事安全问题又时常与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非军事安全问题紧密

联系在一起。在实际中,两种性质不同的安全问题常常互为因果、相互建构,日益融合为一种整体的综合安全格局,并已成为冷战后非洲安全区域化的新动力。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政治安全作为一个特定的安全领域,它是关于社会秩序的组织的稳定性,其核心是国家主权及其合法性所遭受的非军事威胁。<sup>[22]</sup>在非洲,对主权国家的这种非军事威胁除了前面提到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外,最重要的就是难民问题。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内战中,大量难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跨越国境涌向它们的邻国。据统计,两国内战期间,在科特迪瓦,有大约50万流亡者和6.9万难民,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利比里亚。在靠近塞拉利昂边境,有大约1.3万利比里亚难民驻扎。在几内亚,有大约8.9万利比里亚难民和6000名塞拉利昂难民。在利比里亚,也有超过35万流亡者和成千塞拉利昂难民等待安置。在大湖区,连年的内战和冲突造成了400万内部流亡者,其中60万是难民。<sup>[23]</sup>在非洲之角,仅苏丹连年大规模的内战就造成400万人背井离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涌入其邻国;其境内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网络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也影响到肯尼亚、乌干达、索马里、吉布提等邻国。<sup>[24]</sup>这些因国内冲突而产生的流亡者和难民不但会引发跨边界的食品和疾病扩散问题,而且常常与跨边界的革命集团和贸易网络及其他各种次国家行为体联系起来,从而部分助长了暴力冲突。比如,跨边界地带的难民时常按族群聚集,会强化各种民族分离主义;他们还会出于经济目的而支持反政府势力和武装集团。<sup>[25]</sup>

二是与经济安全的关系。在非洲,与战争和冲突相关的经济安全主要体现在不发展、非法贸易等方面。毋庸置疑,经济不发展是非洲战争和冲突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战争和冲突反过来又对经济不发展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而平民成为最重要的牺牲品,其中主要是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据统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非洲有20万儿童死于战火;仅在刚果(金)内战中就有大约200万人被杀或死于战争引发的饥饿和疾病。战争和冲突对基础设施的破坏恶化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并影响到教育、文化、医疗等各项事业。战争和暴力冲突还导致贸易出口和外国投资减少以及国家债务的增加。另外,战争和冲突所引发的战争经济,使非法贸易更加猖獗,包括军火交易、商品走私等,从而为一些牟取暴利的非法商业集团提供了良机。而非法贸易导致的小型 and 轻型武器的扩散加剧

了暴力犯罪和暴力的私人化。<sup>[26]</sup>有研究表明,进入刚果(金)的武器有90%来自乌干达,其余来自卢旺达、苏丹等国,使用者包括本国普通民众、外国士兵、猎人、难民、反叛者及其联盟、商人和企业主等;在塞拉利昂内战中,几内亚比绍军队中从事非法交易的军人跨越边界,对塞境内的分离主义者提供了武器。<sup>[27]</sup>这些非法的武器交易不但助燃了冲突,而且阻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总之,战争和武装冲突既恶化了经济不发展,又加剧了国家的崩溃,从而强化了非洲总体的不安全。

三是与环境安全的关系。环境安全通常涉及因环境恶化和资源匮乏所产生的物质威胁。它与战争和暴力冲突也是相互影响的。比如,严重的环境问题会引发政治不稳定和冲突乃至战争准备。<sup>[28]</sup>冷战结束以来,非洲“新战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那些“失败国家”发生的内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常常是旨在争夺和控制矿产资源,而不是为实现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而战。如刚果(金)、塞拉利昂、安哥拉内战等都带有这种特征。<sup>[29]</sup>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等人认为,非洲的许多内战是经济贪婪而不是政治不满造成的。他们解释说,在非洲许多冲突中,反政府武装并不追求提出一致的政治议题,如利比里亚民族阵线、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和科特迪瓦爱国运动等。作为政治领导,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更多地是在做生意。<sup>[30]</sup>戴维·弗兰西斯称这种战争为“以资源为基础的战争”。<sup>[31]</sup>在非洲之角,所有国家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所影响,如水缺乏、土壤侵蚀、沙漠化以及人口的压力。环境恶化导致的资源短缺与大量增加的人口流动结合起来使冲突很容易发生。在苏丹南部,各种势力对石油的过度开采乃至掠夺,加剧了本就严重的环境问题。<sup>[32]</sup>

四是与社会安全的关系。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与政治安全的关系密切,其指涉对象是那些“非国家的社会集团”,主要是民族、部落等,但也与宗教及种族有关。所以,它是关于集团及其认同的。不同认同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常常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sup>[33]</sup>“以认同为基础的战争”已是非洲“新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sup>[34]</sup>具体而言,非洲内部的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主要表现在3个层次,包括: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民族集团或部落集团间的分歧与争斗,如索马里、肯尼亚、刚果(金)、加纳、几内亚、乍得等国,都发生过此类事件引发的动乱或冲突;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在尼日利亚、苏丹、利比里亚、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等国表现得更加突出;非洲国家间存在的跨界民族问题带来的政治后果,如索马里、埃塞

俄比亚、肯尼亚3国之间,刚果(金)与安哥拉之间,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3国之间,都因跨界民族问题发生过边界冲突。<sup>[35]</sup>这些民族问题与国家失败以及环境、政治等安全问题结合起来,使非洲内部的战争和冲突更加复杂化和持久化。

## 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非洲内部的战争和冲突不能与邻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安全问题分开看待。也就是说,发生在一国的安全问题很容易对邻国的安全形势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既显示出非洲内部冲突的区域化和综合化特征,又赋予非洲实现积极和平的强大动力。那么,谁最有理由成为实现积极和平的核心行为体?不少学者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非洲本地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卡琳·多肯强调:“当前绝大多数暴力冲突具有明显的区域侧面的事实使非洲政治家和援助社会的成员们认识到,解决冲突的可持续的途径必须本质上是区域化的。”<sup>[36]</sup>

诚然,由于非洲的区域、次区域组织作为本区域和平与安全中最直接的“利益攸关方”,它们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也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促使它们既最有可能对现实的危机与冲突做出最快的反应,也最有可能为了持久的地区和平而寻求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况且,由于这些区域、次区域组织与发生冲突的国家、政府及其民众常常有紧密的联系,非洲国家对区域外部干涉也常心存戒心,所以,它们的集体行动更易于为那些国家的冲突各方及其他次国家集团和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可能比外部行为体获取更多的支持。<sup>[37]</sup>在机制上,非洲联盟(AU)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等次区域组织不但有处理危机与冲突的共同的法律框架,而且有预防冲突发生和蔓延的早期预警系统和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的待命部队。这些区域、次区域组织已经建立起颇具自身特色的区域、次区域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此框架内展开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实践。<sup>[38]</sup>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正通过区域一体化建立起非洲区域、次区域的共同体,而区域一体化以培育共同的制度和集体认同为核心,高水平的制度和集体认同不但会强化区域组织的自主性,而且会创造更大的集体利益和更强烈的相互信任,最终使区域组织及其成员国更容易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合作的共同行动,也更容易从根源上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sup>[39]</sup>这阐明了一种事实:“如果非洲自己能够有

效地处理自己的问题,就无需等待外来者的帮助。”<sup>[40]</sup>

[注释]

- [1] 由于北部非洲在安全动力上与中东北非地区联系得更为紧密,本文所说“非洲”不包括这一地区,而是特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本文所指“非洲内部冲突”既包括非洲国家间冲突,又包括非洲国家内部冲突。
- [2] [美]大卫·巴拉什、查尔斯·韦伯:《积极和平:和平与冲突研究》[M],刘成等译,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 [3] Mohammed Ayoob, *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Predicament: State Making, Reg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p. 21.
- [4] [6] [14] [15]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ystems*, Burlington: Ashgate, 2006, pp. 34-36, p. 33, pp. 217-231, p. 59.
- [5]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吴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8页。
- [7] The Fund for Peace, *Failed States Index 2010*,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6/21/2010\\_failed\\_states\\_index\\_interactive\\_map\\_and\\_rankings](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6/21/2010_failed_states_index_interactive_map_and_rankings).
- [8] [9] [10] [16] [21] [25] Karin Dokken, *African Security Politics Redefined*,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42, pp. 3-4, pp. 49-73, pp. 14-15, 57, p. 31, p. 70.
- [11] 焦军普:《跨国公司战争:以美国跨国公司卷入美伊战争、刚果内战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72页。
- [12] John M. Kabia,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West Africa: From ECOMOG to ECOMIL*, Aldershot: Ashgate, 2009, p. 48;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ystems*, p. 33, p. 160.
- [13] Katharina P. Colem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Peace Enforcement: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9-121.
- [17]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http://hdr.undp.org/hdr2006/pdfs/report/HDR06-complete.pdf>.
- [18] Karin Dokken, *African Security Politics Redefined*, p. 4.
- [19]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ystems*, pp. 69-73.
- [20] Keith Somerville, “Africa after the Cold War: Frozen Out or Frozen in Time?” in Louise Fawcett and Yezid Sayigh eds., *The Third World beyond the Cold War: Continuity and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pp. 135-136.
- [22] Barry Buzan and Ole Weaver,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p. 141-161.
- [23] Karin Dokken, *African Security Politics Redefined*, p. 60, p. 68.
- [24]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ystems*, p. 227.
- [26]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ystems*, pp. 60-62.
- [27] Karin Dokken, *African Security Politics Redefined*, p. 66; John M. Kabia,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West Africa*, p. 53.
- [28] 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p. 74-75.
- [29] Osita Agbu, *West Africa's Trouble Spots and the Imperative for Peace-Building*, Dakar: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2006, p. 12.
- [30]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0, p. 101.
- [31]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ystems*, pp. 80-85.
- [32] Karin Dokken, *African Security Politics Redefined*, p. 111.
- [33] 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p. 110-114.
- [34]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ystems*, pp. 76-80.
- [35] 参见罗建波:《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09页。
- [36] Karin Dokken, *African Security Politics Redefined*, p. 79.
- [37] Paul F. Diehl, “Institutional Alternatives to Traditional UN Peacekeeping: An Assessment of Regional and Multi-national Option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19, No. 2 (Winter 1999), p. 213.
- [38] 参见郑先武:《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创新与困境》[J],《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27-36页。
- [39] 参见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179页。
- [40]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ystems*, p. 179.

作者简介: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南京,210093)

收稿日期:2011-05-05

修改日期:2011-07-16

# CONTENTS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The Regionalization of Internal Conflicts in Africa: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erspective**

*by Zheng Xianwu*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ternal conflicts in Africa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regionalized through their cross-border spread. In terms of the root cause of conflicts and actual influence, such regionalization takes a comprehensive form, viz. it includes several levels such as global, regional, sub-regional,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and several areas such as military, politic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nd forms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attern consisting of multi-levels and multi-areas and their close interaction. Thus, it requires African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to play a central role in Africa's internal conflict resolution.

### **7 An 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of Negotiation of the Signing of the "Oslo Accords"** *by Ding Dali*

On September 13, 1993, Palestine and Israel signed the "Oslo Accords", and the PLO and Israel achieved mutual recognition. The success of the signing of the accord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Palestinian-Israeli negotiations in Oslo. In terms of negotiation study, the reasons for the tremendous success of this negoti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avorable background and ripe of time for negotiation, strict secrecy in negotiation, the attitude of Palestine and Israel towards the negotiations, the optimism of both sides, effective involvement on the part of Norway.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slo negotiation is worthy of thinking and learning.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3 On the Partnership Principle of EU Regional Policy**

*by Zhu Guichang*

Partnership principl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EU regional policy.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rinciple has promo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authorities at the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 and subnational social-economic actors in the drawing-up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policies. However, the extent of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roles are quite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regional policy and in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Despite the constrain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partnership principle, and its limited role in regional policy, it has deep impact on the EU governance and has made EU governance more characterized with multi-level governance.

### **19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on Military Strike against Libya of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1980's**

*by Zhang Yang*

Libya was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e contention of the U. S.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because of its rich oil resource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Gaddafi implemented anti-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9.1" revolution, which challenged U. S. interest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ried hard to subvert the Gaddafi regime by military provocation, overt sanction, and covert operation during the 1980's and struck Libya by El Dorado Canyon operation in the name of countering terrorism. The military strike against Libya is U. S. strategic choice afte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military power comparison,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game of the Cold War and geopolitics. The strike is a necessary step of the U.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North Africa and West Asia.

### **26 On the "SADC Way" in Southern Afri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by Li Pengtao*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certain norms and values have emerged, such as government dominance, supremacy of sovereignty, regional solidarity and non-institu-